

# 從《將軍碑》分析張大春對“歷史”的質疑

黃俊基\*

**摘要** 本文透過分析張大春的〈將軍碑〉，探討如何在這部魔幻現實故事中定義“歷史”與“真實”。透過分析將軍、兒子維揚與傳記作家石琦三個立場各異、行動目的不同的人，如何導致將軍的歷史越發模糊且混亂。本文嘗試探討文中的象徵與持份者對某段歷史的態度與影響。最後，分析張大春如何質疑“文字語言”，以及如何看待社會上所說的“真實”。

**關鍵詞** 張大春 將軍碑 歷史 真實

## 一 前言：文學角度上的“寫實”

〈將軍碑〉一文運用錯綜複雜的時間線敘述一名將軍的歷史，反映出張大春對於敘述歷史的質疑。這一種對於現實的質疑其實貫穿張大春大大小小的作品。筆者嘗試透過〈將軍碑〉一文，分析文中物件的象徵意義。然後，分析各個故事人物的口述歷史，探討張大春對於“記述歷史”的立場和觀點。

“寫實”一詞顧名思義就是描述現實發生的事。人們嘗試用文字，記載歷史事件供他人傳閱。而張大春質疑這一種“歷史”，在〈預知毀滅紀事〉中他曾指出“真實”的意義在不斷擴大和分裂。<sup>1</sup> 又在〈走路人〉上指出“我逐漸發覺到記憶和夢、歷史、宗教、政治、新聞報導一樣，都是些你相信之後才真實起來的東西。”<sup>2</sup>。這些作品滲透了張大春的質疑。蔡源煌也認為〈將軍碑〉看似讓人了解“寫實”，其實是讓人反省何謂“事實”。<sup>3</sup>

## 二 “文字語言”的象徵意義

張大春定義了“文字語言”是一種幻想，那麼以文字語言記載的東西固然也是一種幻覺。〈將軍碑〉中，承載語言文字的工具，如回憶錄、將軍碑、演講辭等。這些事物都是主觀的敘事，又何來真實？故此，以下細分這些物件的象徵意

---

\* 香港大學文學院本科生，主修中國語言文學。

<sup>1</sup> 陳義芝主編：《台灣現代小說史綜論》（台北：聯經書房，1998年），頁365。

<sup>2</sup> 施淑、高天生主編：《台灣作家全集——張大春集》（台北：前衛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頁59。

<sup>3</sup> 蔡源煌：〈八〇年代的寵兒張大春〉，《四喜憂國》（台北：遠流出版公司，2001年），頁232。

義，並分析它們在文章主題表達上的作用。

## 1. 回憶錄——個人對於自身歷史的定義

回憶錄最先出現在文章之中，用作記載將軍顯赫的過去。回憶錄好比日記，記載自己想傳世的事件。當中收納的事情，好與壞、善與惡等，都取決於自我的敘述。故此，回憶錄就是將軍對自我歷史的定義。故事中，傳記作家石琦就希望“為大時代留下見證”<sup>4</sup>，盡可能收集將軍的所見所聞，讓將軍的歷史流傳後世；對於將軍而言，打了一輩子的仗，種種事件又何以能夠一本書概括得了，因此學者門紅麗認為將軍定義自己的時代所採取的行動就是“不語”<sup>5</sup>。引申而言是將軍的取捨。與其不能盡錄自己的歷史，倒不如隻字不提，用自己的方式去紀錄自己的人生。

將軍這一行動反映出了張大春隱含的信息——“語言文字”的極限。<sup>6</sup>對於個人歷史，張大春探討了書寫的限制，質疑這一種以個人記憶的手段是否能完全記載事件。這一種主觀描述是否忽略他者的角度，缺乏不同角度的觀點能否稱得上事實而不是主觀描述。對於傳記、回憶錄表現出的真實、歷史，其實就是學者劉慧珠所說的“相對於現實的世界”<sup>7</sup>，只是個人的版本相對他人而言較為可信而已。

## 2. 將軍碑和演講辭——他者對於自我歷史的定義

文中的墓碑和演講辭就如他人對自我的定義。這些觀點有好壞、有愛恨，都是自我無法改變的主觀立場。記載的訊息自然也跟隨著他者的主觀意識改變。換言之，自己能夠從傳記定義人生是否成功；他人也能夠定義他們各自是甚麼樣的人。

〈將軍碑〉中的將軍對於自己紀念碑的刻字，斬釘截鐵地說“假的”。聽完兒子的演講後，又向管家詢問自己是否為了妻子不吃飯，事實卻與兒子所說的相反。種種跡象表明，他人對自身的定義與事實背道而馳。但前提是這些東西都在將軍死後才出現，也就是說這些敘述是後世人如何看待將軍這一人，將軍對此是無法修改和干涉的。縱使事情是虛構的，也死無憑證。哪一個說法才是真實的描述？自我的描述，還是他者的描述可信？這些疑問其實就如張大春所說：“人死

<sup>4</sup> 張大春：〈將軍碑〉，《四喜憂國》（台北：時報文化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頁2。

<sup>5</sup> 門紅麗：〈超越時間的掙扎與身份認同的危機——析張大春小說《將軍碑》與《四喜憂國》〉，《小說評論》，2012年2期，頁164。

<sup>6</sup> 劉慧珠：〈寫實的跨越——張大春將軍碑四喜憂國的虛實書寫〉，《修平學報》，2003年6期，頁142。

<sup>7</sup> 同上注。

後就沒什麼矛盾”。這也呼應了文首——將軍大壽之中對客人重申不要建紀念碑，但卻事與願違。

### 3. 共同象徵——名聲

回憶錄、紀念碑和演講辭，無論是自我或者是他人的定義，這些事物的出發點就是對“名聲”的維護。這些都會影響後世如何看待將軍這一人。綜觀文本，即使將軍的一生有好有壞，但被敘述的往往都是好的方面。這也是為何將軍抗拒這些“好辭”。歷史紀錄夾雜了種種的誇大、掩飾，目的在維護個人的名聲。到最後，將軍稱兒子也會經歷這一切，暗指這一種互相維護變成了民族習慣，引申出張大春對於現實社會上，人們在互相掩飾、撒謊，將虛構變為真實的現象，從而導致沒什麼值得相信。

### 4. 小結

王德威認為〈將軍碑〉中“數種有關書寫歷史的定義如何衝撞質疑”<sup>8</sup>，這也是本章的目的。張大春透過不同的書寫手段，間接表現出書寫歷史的盲點。社會上最值得相信的就是“歷史”，而歷史卻是從主觀敘述中誕生出來的“事實”。這一衝突完全打破了觀眾的固有思想，引出何謂“歷史”和“真實”的質疑。這也是〈將軍碑〉給觀眾帶來的反思。

## 三 角色對歷史的立場

〈將軍碑〉中的主要角色就是將軍、兒子維揚和傳記作家石琦，這三人的敘述不只豐富了文章的記述角度，而且展現出三種人物對於歷史的觀點。上文探討了“歷史”的真實性，此章嘗試以不同角色的角度出發，分析他們如何主動、被動地修改歷史，以及分析他們行動背後的原因。

### 1. 將軍角度的歷史

#### a. 被動式虛構

所謂的被動式虛構，就是將軍無意識地挑選了歷史呈現他人眼前。最主要的例子就是將軍帶石琦回到了“北伐軍克復九江的情形”。站在將軍的角度，他向記者描述自己參與過的戰役就如如實作答一般，帶石琦回到她想要紀錄的歷史。但仔細揣摩，將軍其實無意識之間選擇了“他想要觀眾看到的事情”而不是“他

---

<sup>8</sup> 王德威：《眾聲喧嘩——三〇與八〇年代中國小說》（台北：遠流出版公司，1988年），頁273。

人想要知道的事情”。從石琦看到將軍意氣風發在會議上戰前部署，到戰事結束後街上掛著血淋淋的人頭，這一種敘述歷史某程度上是“以部分歷史代替全部歷史”，好讓石琦覺得將軍的地位非凡、經歷出眾。將軍藉此虛構出屬於自己的歷史，但是沒有人知道他在此事中擔任甚麼樣的角色，只看到了戰事裡他所參與的“戰前部署”和“戰後結果”，最終卻呈現出將軍消滅了敵軍的假象。

## b. 主動式虛構

將軍在文中有意識地修改、掩飾自己的歷史，就如將軍謊報兒子回家探望的次數、逗留的日數等等，其目的在於營造一個良好父子關係的假象，最後連將軍自己都分不清事實和謊言。而將軍又特意向管家謊稱自己沒有參與在保衛軍鬥爭當中，將軍的目的就是掩蓋自己在這場鬥爭之中救了鴉片商的岳父，受了他的援助，讓將軍日後的軍隊得以發展。“將軍”之名也算是勾搭惡勢力才有的名銜，以至於將軍討厭他人的褒獎。

將軍主動修改歷史的行為無異是“自我形象的塑造”，在他人面前塑造出一位被兒子疼愛的父親和一位清廉的將軍。這或許是張大春想要借助人物的行為所表達的思想——自我的描述並不可信。對於將軍在保衛軍戰事上否認殘殺無辜一事，學者持有不同的觀點，李智鑫認為是主動的撒謊；<sup>9</sup> 李白楊認為是無意識的掩飾；<sup>10</sup> 筆者較傾向於李智鑫的說法。因為張大春在情節編排上，將軍先得知兒子在自己死後仍然未婚一事，然後觸發自己思考行軍的報應，再與管家回到過去證明。可見，他是有意回到過去修改自己的歷史，好讓自己心安，這也呼應了上文“自我對歷史的定義”。

## 2. 兒子角度的歷史

### a. 無意識虛構

作為將軍的兒子，維揚對於將軍的歷史自然比其他人的認知更多。另一方面，文章中不難看出維揚對於父親的恨多於愛。這一種恨，導致他對將軍所作所為的描述增添了一份主觀意識。既然將軍口述的歷史值得質疑，那麼維揚所說的母親被將軍逼死、自己被將軍罰站三天等的情節，其實也值得質疑。維揚對於父親的行為有了偏見，導致他口述的歷史傾向誇大和醜化將軍，無意之間虛構了自己喜歡的版本的歷史。

---

<sup>9</sup> 李智鑫：〈時間、記憶與歷史：論《將軍碑》的敘述策略〉，《華文文學評論（第8輯）》（成都：四川大學出版社，2021年），頁362。

<sup>10</sup> 李白楊：〈論《將軍碑》的敘事時間〉，《世界華文文學論壇》，2005年1期，頁20-21。

## b. 有意識虛構

對於維揚演講一些錯誤的歷史，將軍對他提出質疑，而他的回答是“只不過是一個演講而已”。兒子虛構了將軍為照顧妻子而不吃飯的好丈夫形象，而一改母親是自殺的記憶。這一行為對於維揚而言理應難以啟齒，但他卻若無其事地說了整段演講。儘管他否定將軍的這一種歷史，但他選擇虛構出“他人希望的歷史”。這也聯繫到上文提到的維護“名聲”的目的。張大春借助將軍角度指出“人一死，其實沒什麼好矛盾的”，最終都會被褒獎，沒人會說死人的壞話。這也是為何親人視角下的個人歷史也不值得信任。

## 3. 父子之間的歷史衝突

張大春有意進一步談及父子敘述歷史裡面的“視差”問題。例如維揚談論自己兒時被將軍體罰一事。從維揚的角度，將軍一直強迫自己成為軍人，這讓他感到痛苦；從將軍的角度，兒子穿上軍裝的笑顏讓他有一種錯覺以為兒子喜歡行軍打仗。張大春將兩個角度同時敘述，凸顯出一件事在不同角度會有不同的立場，而歷史涉及的人物數之不盡，要確認一個歷史的“真實”就要統一每個持份者的觀點，但這是不可能的。

從觀眾角度而言，將軍因年老而不記得維揚小時候的事，但張大春巧妙地揭穿將軍的假面具，紀錄將軍把石琦帶到“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北伐軍克復九江的情形”、把管家帶到“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日的上海”和要求兒子回到臺兒莊看“二十軍團重創日本”，可見將軍是選擇性地記住“他認為有價值的事件”。相對維揚而言，兒時的心理創傷是他刻骨銘心的事件。故此，張大春嘗試解釋為何敘述的歷史不可信，原因在於他人會以個人的喜好選擇歷史片段，漸漸整段歷史已經變得沒有“矛盾”。

## 4. 石琦角度的歷史

局外人石琦對於將軍的歷史自然比將軍的親人來得少，而她卻以自己的專業干涉其中。石琦一方面聽說將軍以前征戰沙場的事蹟，另一方面聽說維揚的童年陰影，以及夫人被將軍逼死的觀點。夾在兩種立場之中的石琦，一開始就只有一種立場，就是選擇支持將軍輝煌的歷史。石琦為維揚撰寫演講辭證明了她選擇美化將軍，也就如學者李智鑫所說，她選擇了掩蓋父子之間的矛盾，美化了將軍的一生。<sup>11</sup> 這一些行為背後的目的就是為了自己撰寫的“將軍回憶錄”能在新聞上找到關注度，並得到商業賣點。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石琦採訪將軍的時候，並非將軍敘述自己的歷史，而是石琦選擇某個歷史讓將軍敘述。她選擇收集“觀

---

<sup>11</sup> 同注 9，頁 363。

眾喜歡的歷史”，目的就是讓“他人歷史”成為“商業價值”。那麼內容是否真實，就不太重要了。

## 5. 小結

學者李智鑫對於〈將軍碑〉指出“記憶是親歷者的過去，而歷史就是後人根據資料主觀的書寫，所以歷史必然受到選擇、他人干涉等等因素所構造的”<sup>12</sup>。本文支持這一觀點，上述三個人物的角度分析也反映了這一觀點。不論是親身經歷者、親人的敘述還是陌生人的角度，他們各自有主觀意識，這一種主觀意識會讓他們有意或者無意之間虛構了歷史，層層篩選所謂的真實，最後得出的結果就是“歷史”。這一章也體現出每個角色行為背後的動機，從而了解到“歷史”之所以受到張大春質疑的原因。

## 四 結語

後設小說嘗試讓讀者進入小說之中的虛構世界，令讀者了解小說是一種文字的幻想，用於打破寫實主義的觀點。<sup>13</sup> 張大春在〈將軍碑〉中嘗試用不同的時間線解釋將軍的一生，目的就是讓讀者從中質疑“文字語言”的可信性。而本文亦在不同人物的視角下，多角度分析在一個人的“歷史”中，不同人對於歷史的立場以及他們如何定義他人的歷史。筆者藉著〈將軍碑〉，嘗試解釋張大春對於“歷史”的立場。“歷史”的書寫有維護名聲、有誇大名譽、有掩飾黑暗等特點，種種主觀敘述導致“真實”變得模糊。張大春藉此讓觀眾反觀現實社會，人民所認為的真實，正如他所說“相信了才會變為真實”。張大春巧妙地利用“敘述歷史”作為骨幹，而他人對將軍的歷史作出干涉之後，這一篇“魔幻現實主義”或者是“超現實主義”小說中的“現實”二字漸漸被刪走。整個記憶、歷史，彷彿都是虛構的。小說故事固然是虛構的，故事之中的“真實”也是虛構的；最終，反觀小說外的現實，其實如同我們假設小說中的“歷史”是真實一樣，說明社會除了小說是“虛構”之外，其實社會本身也是“虛構”、“不真實”的。

---

<sup>12</sup> 同注 9，頁 364。

<sup>13</sup> 同注 6，頁 131。